

俞平伯

散文选集

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

百花散文书系·现代部分

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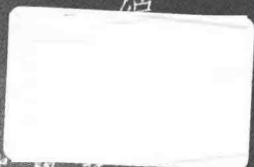


百花散文书系·现代部分

主编 林呐 徐柏容 郑法清

俞平伯散文选集

孙玉蓉 仙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俞平伯散文选集/孙玉蓉编. —3 版. —天津: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 6
(百花散文书系. 现代部分)
ISBN 978—7—5306—5345—6

I . 俞... II . 孙... III 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 . I 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9878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
*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875 插页 2 字数 205 千字

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 定价: 24.00 元

编 辑 例 言

一、本套书是《百花散文书系》的一个组成部分。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，按人专集分册。

二、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，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。

三、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，简单介绍作者生平，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，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。

四、所选作品，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；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。

序 言

孙玉蓉

—

俞平伯是“五四”以来的著名诗人、散文家、红学家，也是研究古典诗词曲的专家。1900年出生于苏州。原籍浙江省德清县。取名铭衡，字平伯，乳名僧宝，以字行。他出身于旧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高祖父俞鸿渐是清朝举人，诗人，著有《印雪轩诗钞》。曾祖父俞樾是清代的经学大师，著有《春在堂全书》五百余卷。他的童年就是跟着曾祖父在苏州度过的。父亲俞陛云是晚清探花，官翰林院编修，能诗文，著有《绚华室诗

忆》、《蜀道诗记》、《小竹里馆吟草》、《诗境浅说》、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等。母亲许之仙是杭州名门之女，也工诗文。

俞平伯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古文化的熏陶，奠定了雄厚的旧学基础。辛亥革命以后，他开始接受新学教育，曾到上海学习英文和算学。1915年，他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部，并举家迁居北京，与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睦邻。

1920年初，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俞平伯与傅斯年一起赴英国留学，因经费不足，数月即归。尔后，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。

1922年夏，他赴美国考察教育，在纽约仅住一个月，即因病回国。翌年，他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。1924年，他又回到北京，先后在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国大学任教。建国后，他任北京大学教授，后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）古典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。

俞平伯知识渊博，兴趣广泛。作为散文家，有散文集《剑鞘》（与叶圣陶合集）、《杂拌儿》、《燕知

序言

草》、《杂拌儿之二》、《古槐梦遇》、《燕郊集》等行世；做为五四时期的新诗人，他有诗集《冬夜》、《西还》、《忆》以及与朱自清等八人的新诗合集《雪朝》；做为红学家，他的论著有七十余万字，包括他早年的《红楼梦辨》和后来改版的《红楼梦研究》，均收在《俞平伯论〈红楼梦〉》中；做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，他先后出版了《读诗札记》、《读词偶得》、《清真词释》、《唐宋词选释》，他的五十万余字的《论诗词曲杂著》，则是集大成者。他还出版了《古槐书屋词》和《俞平伯旧体诗钞》等。

二

俞平伯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，他的思想曾经历一个曲折发展的心路历程。在蓬勃昂扬的“五四”时期，俞平伯有过一段“浮躁凌厉”、思想激进的光辉历史。

1918年初，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，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，凭着青年人特有的敏感和热情，开始试作白话诗。随后，他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的筹备工作，并被推选为新潮社干事部书

记。1919年4月，他加入了“以增进平民智识，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”的平民教育讲演团，为民众的觉醒奔走呼号。五四运动爆发时，他刚好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，他憧憬着光明，向往着民主，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之中。1921年初，他以自己新文学创作的实绩，加入了文学研究会，并成为骨干成员。1922年1月，他和朱自清、叶圣陶、刘延陵创办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刊新诗的《诗》月刊，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《诗底进化的还原论》，提出诗是平民的，而且应该回到平民的主张。

1922年7月，他赴美国考察教育时，在海行船上思考救治中国的方法，他认为政治、工商业人才是中国的中坚，总结历史的经验，提出“现在最要紧的是联合（人才集中），更要紧的，是有主义的联合，不是私人的联合。”他说：“我们不当忠于一个人，应当忠于一个主义。近来国内发生新的政治运动，我很欣喜，希望他们能真实地做出一点事，不要随波逐流，蹈前车底覆辙，反为他人造机会。”（《东游杂志》）真诚地寄希望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。

1923年4月，他的红学专著《红楼梦辨》问世。这是一本以考证为主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作，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是有开拓性意义和卓越贡献的。由于红学资料的欠缺，书中个别观点的不成熟和论证的不全面也是难免的。然而他没有居功，却是严以自责。当他发现了书中的一些错误后，即写了《〈红楼梦辨〉的修正》和《修正〈红楼梦辨〉的一个楔子》等文章，提出首先要修正的是“《红楼梦》为作者的自叙传”这一观点。他检讨自己在书中“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”，“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线”，希望“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念的索隐派的‘红学’”。他敢于坚持正确的观点，也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，这种治学态度，贯穿他学术研究的始终。

但是，1925年“五卅”惨案发生后，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，俞平伯的思想一度陷入消沉和混乱之中，创作也日益脱离现实。他写了《雪耻与御侮》一文，认为“被侮之责在人，我之耻小；自侮之责在我，我之耻大”，年来国耻大于外辱，所以，主张必先自强，然后能御侮。文章发表后，郑振铎

曾代表叶圣陶、沈雁冰、王伯祥等人，连续写文，给予批评。对此，俞平伯并不讳言。1928年，他仍将《雪耻与御侮》收入《杂拌儿》文集，意在“存此以见吾拙”。三十年后，他在《哀念郑振铎同志》和《忆振铎兄》中，均忆及此事，并肯定郑振铎所主张的“以群众的武力来抵抗强暴才是当务之急，切要之图”是对的，说“他已认清了中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”，“而革命的第一步就是‘反帝’”。

尽管如此，俞平伯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命运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他曾写信给胡适，述忧国忧民之心，以为知识分子救国之道唯有出普及本单行周刊，从精神上开发民智，抵御外侮。

1932年元旦，他在《贡献给今日的青年》献词中，告诫青年们要自信，要有救国之心，要手造救国的因缘，“不存此心，不得名为中国人。”表现出一个“不敢放弃国民之天责”的知识分子的气节。

同年“一·二八”淞沪之战后，他写信给叶圣陶，谈对战争的看法，认为“政府既不守三省于前，又不战淞沪于后，其意无非欲和平。”财阀营私，“军阀拥兵，而洋奴媚外，此三者苟合以误国，不和焉可得哉！”政府既然“忍辱苟合”，“淞沪之

牺牲未免冤之又冤”。“弟虽现不居闸北，得幸免于无代价之牺牲，然如此苟全，亦何聊赖。”观点极其鲜明。

抗战期间，他因照顾年迈的双亲，未能同清华大学一起南迁。在北平沦陷区，日伪办的北京大学多次邀请他去任教，他都断然拒绝，宁肯过着清苦的生活。四十年代初，他曾作咏荷律句：“野塘十顷几荷田，一水含清出玉泉。菱蒂无端牵昨梦，萍根难值况今年。红妆飘粉谁怜藕，翠袖分珠不是圆。莫怯荒圃归去早，西山娟碧晚来鲜。”其中“一水含清出玉泉”，“西山娟碧晚来鲜”，都是双关语，他借此表明索居荒城、一片清白的心迹。对于周作人的附逆，他感到可惜，也为自己与周作人“同在一城，不能出切直之谏言，尼其沾裳濡足之厄于万一”而深自愧咎。

抗战胜利后，经许德珩介绍，他加入了提倡民主与科学的知识分子的进步团体九三学社；他还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“中国民主革命同盟”。1947年，他和同仁们先后发表了《保障人权宣言》、《北京大学教授宣言》和《告学生与政府书》等，支持青年学生反饥饿、反内战的运动。1948

年，他和北平各大学教授联名在报纸上发表声明，抗议国民党轰炸开封古城，严正斥责国民党大打内战的罪行。同年7月，他在关于《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》的座谈会上，谈道：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，即是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。强调知识分子要保持自己的气节。

1949年1月，北平围城期间，他与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三十人发表了对全面和平书面意见，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提出的和平八项主张。同年7月1日，他冒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八周年集会，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、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佩服不已，对“群众的庄严的秩序和那高度的觉醒”深为震惊，情不自禁地作了充满激情的六十一行新诗《七月一日红旗的雨》，抒发自己的欣喜之情，并在7月10日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八天的会上，朗诵了这首诗。他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喜悦和虔诚的心情，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。他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、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，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、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九三学社第四、五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。1959年，他在

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《五四忆往》中，谈到四十年前，自己还坚信古人之言：“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！”“却想不到‘河清’真被咱们等着了。”欣喜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觉得自己也年轻了许多。作为一个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老知识分子，他对新中国是充满了希望和期待的。他没有想到建国仅仅五年，他就因为《红楼梦》研究观点上的分歧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，在十年动乱中吃尽了苦头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政治上拨乱反正，经济上整顿提高，国家建设走上了正轨，人民在充满希望中前进。八十岁的俞平伯有感于此，又作了《近闻书感》诗：“襟怀奋发感人，言路宏开才路新，整顿提高三载绩，同看前景是青春。”在他的心中，对祖国的未来始终是乐观的，充满信心的。他就是这样“脚踏实地，步步前进，数十年如一日”，真诚地追求着进步与光明。

三

俞平伯的散文创作经历了由繁缛到素朴的发展过程。他有描写的才力，二十年代，他用漂亮

缜密的写法，创作了不少十分精彩的抒情散文，如融情景于一气的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、《陶然亭的雪》、《湖楼小撷》、《西湖的六月十八夜》等，这些作品的素材都撷取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。正是这些散文名篇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。

《湖楼小撷》堪称景物描写的佳作，充满了诗情画意，充分体现了俞平伯散文繁缛雅致的特色。其中第二则《绯桃花下的轻阴》中，作者写道：“正在春阴里的，正在桃花下的孩子们，你们自珍重，你们自爱惜！否则春阴中恐不免要夹着飘洒萧疏的泪雨，而桃树下将有成阵的残红了。”这既是寓情于景的描写，又是含有哲理的告诫。他在《坚匏别墅的碧桃与枫叶》中，描写桃花，“山桃妖娆，杏花娇怯，海棠柔媚，樱花韶秀，千叶桃秾丽，这些深深浅浅都是红的，千叶桃独近于绛。来时船过断桥，已见宝石山腰，万紫千红映以一绿；再近，则见云锦的花萼簇拥出一座玲珑纤巧的楼阁。及循苔侵的石磴宛宛而登，露台对坐，更伫立徘徊于碧桃树下，漫天匝地，堆绮翦琼，委地盈枝，上下一赤。其时天色微阴，于乳色的面

纱里饱看搽浓脂抹艳粉的春天姑娘。”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画面由远及近，由浑然到清晰，一步步逼近，有色有光有声有动，描绘得维妙维肖。光是花的红色，就有“深深浅浅”的红，“近于绎”的红，“万紫千红映以一绿”的红和“上下一赤”的红，颜色上的差别依稀可见，而更可见的是他在描景中所含的情。他描写枫叶，“冷峭的西风，把透明如红宝石，三尖形的大叶子响得萧萧瑟瑟，也就是响得希里而花拉。一抹的斜日，半明半昧地躺在丹枫身上，真真寂寞杀人。”仅三言两语，就把听觉、视觉、感觉都恰如其分地描绘出来。他所表现的外界景物与感觉心象，匀融无间。其辞若脱口而出，无一矫揉装束之态。他的作品言情写景能够沁人心脾，豁人耳目，皆源于丰富、充实的生活底蕴，皆“以其所见者真，所知者深也。”所以苏雪林以为他的散文具有注意细致绵密的描写的特点。和他的议论文相比，他的抒情散文是不很多的，但影响却远远超出议论文。

几年后，作者对繁缛的描写感到厌倦，开始追求自然素朴的趣味。注重于“传神”，讲究“略尽笔墨而神情毕肖”，追求一种“奇在全不着力而得

妙肖”的简洁风格。这是他的散文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。他说：“刻画大苦，抒写甚乐，舍乐而就苦”，岂不自讨苦吃。他在《城站》、《清河坊》、《出卖信纸》一类散文里，记叙在杭州时琐屑的日常生活，抒写自己对往事的依恋，对亲人的情爱，写得如行云流水，自然平淡。这种艺术境界，没有渊博的学识，自身的人格修养和笔底的功力，是很难达到的。正如作者自己所言：“这种微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触，实是无数的前尘前梦酝酿成的，没有一桩特殊事情可指点，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。”他在《清河坊》中声明道：“我决不想描写杭州狭陋的街道和店铺，我没有那般细磨细琢的工夫。……我所亟亟要显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恋……”《燕知草》的后半部分作品，就愈益接近那种“韶秀以外竟似无物”的境界。《城站》写的是作者由上海北站乘夜快车回杭州探家的情形。杭州城站，在作者看来，似乎处处比上海北站好得多，他说：“其实西子湖的妩媚，城站原也未必有分。只因为我省得已到家了，这不同岂非当然。”一种“不怨桥长，行近伊家土亦香”的欣然感，使他所见到的一切都蒙上了情感的色彩。清

河坊巷本是杭州一条典型的逼窄的铺石板而不修马路的长街，在作者眼中也是那么可爱，因为它曾留下作者一家“多少的踪迹”。正是“只缘曾系乌篷艇，野水无情亦耐看。”这里作者已经告诉我们：他之所以对杭州的街市感到亲切，是因为有比街市更亲切的人在。他说：“人和‘其他’外缘的关联，打开窗子说亮话，是没有那回事。真的不可须臾离的外缘是人与人的系属，所谓人间便是。我们试想：若没有飘零的游子，则西风下的黄叶，原不妨由它们花花自己去响着。若没有憔悴的女儿，则枯干了的红莲花瓣，何必常夹在诗集中呢？人万一没有悲欢离合，月即使有阴晴圆缺，又何为呢？……一言蔽之，人对于万有的趣味，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。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，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毕落于渺茫了。”（《清河坊》）触景生情、睹物思人，作者从自己的经验中，总结出人对于万有的趣味与人间趣味的关系。这段哲理性的表述对于我们理解他的作品起了很好的导读作用。

俞平伯散文重趣味，崇自然，尚简洁风格的形成，与他多方面地吸收古典文学的艺术营养是很